
战后日本外交战略理念及对外关系轨迹

吕耀东

内容提要：日本战后70年的外交战略理念经历了“经济中心主义”、“正常国家论”和大国化政治诉求等演进历程。“经济中心主义”的外交战略理念开创了20世纪50~60年代“吉田茂主义”经济外交的黄金时代，为20世纪70年代日本以“世界经济大国”身份开展“多元化”的自主外交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及国力基础。在冷战结束前后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日本关于“政治大国”理念与“正常国家论”的“国际国家”诉求，反映出日本力求改变“战后体制”的强烈意愿。进入21世纪，日本开展的战略性外交与价值观念外交，是基于“大国化”政治诉求而进行的“自我实现”，完全是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出发的。“正常国家论”关于大国化的政治诉求，逐渐显露出日本“传统的国家主义”面目，并将成为日本主流的对外关系理念和实践目标。

关键词：日本外交战略 经济中心主义 正常国家论 战略性外交 价值观念外交

作者简介：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8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5)05-0061-15

外交战略，指国家间在交流和交往过程中根据各国不同情况，在一定时期内，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出发点而制定的对外关系路线及方略。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各方面关系到本国发展及对外关系的宏观性构想。考察战后70年日本外交战略及对外关系的发展轨迹，要将战后以来国际格局及变动与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等因素结合起来，尤其是要注重日本作为战败国与战后国际秩序的相关性分析。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日本外交深受内政及其外交决策机制的影响。正如日本学者五百旗头真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一书中所言：主导战后日本的主要基本路线有社会民主主义、经济中心主义和传

统的国家主义三条政治外交路线^①，足见外交必然是日本国内政治需要的产物。本文认为，战后日本外交有着自身特有的发展路径和特征，经历了以经济外交改变战败国形象、通过“亲美人亚”力求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论”的“大国化”政治诉求等发展阶段。

一 基于“经济中心主义”的外交战略理念及实施

（一）占领期的日本外交准备

日本战败投降后，由驻日盟军对日本实施占领，决定了日美关系成为战后日本的“外交基轴”。因战败被剥夺主权的日本丧失了外交权，在日本政府的请求下，盟军总部（GHQ）决定通过日本政府进行间接统治的方针，停止“日本的外交职能”和“国外的外交活动”，但是日本外务省被保留下来，进行媾和的前期准备工作。^②这一时期，日本进行恢复外交活动的前期准备，虽然这种“外交准备”有很多是 GHQ 主导日本政府进行的，但占领期关于外交方面的相关原则和精神的确立，却对未来日本外交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占领期的日本虽然因战败丧失外交权，但围绕不可避免的“外交”相关问题展开了积极的交涉与磋商。

首先，参与由 GHQ 主导制定“和平宪法”相关提议。其中，宪法第九条规定“放弃战争、战争力量及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等条款，“据说这个第九条是在新宪法制定过程中经币原首相主张而加入的，他就其意图做了如下说明：‘今天我们高举宣布放弃战争的大旗，在国际局势的辽阔原野中虽然是特立独行，但是，全世界早晚会从战争的惨祸中觉醒过来，终将同我们共树一帜’。丸山真男在介绍币原的这个发言并且探讨其历史意义时说：‘它预见第九条在核武器时代的新意义，毋宁说是把国际社会中的先锋使命托付给了日本。’”^③这说明出自于日本决策者本意的外交战略意图得以实行。关于第九条涉及自卫权的问题，在吉田内阁时期，“政府的官方见解就归结为，根据法律原理虽然有自卫权，但按照宪法第九条规定，‘不能进行自卫战争’”^④。

① 五百旗头真主编：《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吴万虹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212页。

② 参见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719、721页。

③ 转引自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第731页。

④ 同上书，第732页。

这也是吉田茂提出“重经济、轻军备”，形成基于“经济中心主义”的外交战略理念的起始点。

其次，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为了实现自主的外交权，力求同战胜国缔结和平条约，以图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然而，美国主导的1951年9月8日“旧金山片面媾和”，不仅苏联等国家拒绝签字，而且作为主要战胜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被排除在外，这也是造成后来日苏关系、日中关系复杂的原因之一。上述两方面的“外交准备”，深刻地影响了战后日本外交的发展走向。

盟军单独占领日本期间，尽管“日本内阁对盟国的要求绝不敢有丝毫怠慢，却将宪法第九条视为束缚手脚的镣铐”^①。日本大致确立了今后依托美国庇护、回归国际社会、发展壮大国力的“重建日本”外交战略意图。历史事实证明，这一外交战略得到了充分展现与发挥。战后日本积极主动发展日美关系，得到美国的宽大媾和条件和安全保障措施，日方从日美基轴路线中得到的“外交便利”是显而易见的。

（二）“吉田茂主义”经济外交

旧金山片面媾和条约“生效”（1952年4月28日）之后，日本获得了国际社会对于其“主体性”的承认。基于二战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惨败的历史教训，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府确立了“重经济、轻军备”，与美国结盟的国家发展战略，即用部分国家主权换取美国的军事保护，将主要精力投入经济建设的发展路线，这就是“吉田茂主义”。这一发展路线不仅使日本经济在1952年就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在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西方阵营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②

占领结束之后，吉田内阁从复兴经济、主导亚洲的战略目标出发，视东南亚为日本经济复兴的关键，重点开展对东南亚、南亚的“赔偿外交”，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修复因战争而破裂的外交关系，加强对该地区的笼络和掌控。这一时期日本外交的基本特征是，以经济外交为主，通过经济外交手段，消除东南亚国家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怨恨和疑虑。首先，日本针对东亚国家开展带有战争赔偿性质的经济外交。可以说，日本的战争赔偿是日本恢复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起点。《旧金山和约》签署后，日本开始了同亚洲各国的“战后处理”问题谈判。日本与印尼、菲律宾、缅甸、南越等东南亚四国

^① 加文·麦科马克：《附庸国：美国怀抱中的日本》，于占杰、许春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56页。

^② 参风曲静：《近代以来日本外交战略的三次转变及其原因》，《日本学论坛》2008年第4期。

进行了基于《旧金山和约》所规定“战争赔偿”的外交谈判。尽管赔偿数额远远低于东南亚国家的初衷，但日本还是“建立了向东南亚进行经济扩张的立足点”^①。其次，日本积极开展贸易、投资和援助三位一体的经济外交。在日本经济得到高速发展后，日本同东亚邻国的经济外交形式，由原来的劳务赔偿模式转变为政府开发援助（ODA）的“准赔偿”方式。日本于 1954 年加入了由英联邦国家发起的，旨在通过以资金和技术援助、教育及培训计划等形式加强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科伦坡计划”（Colombo Plan）国际合作项目，并于 1958 年开始援助印度等国。1967 年借东盟成立之契机，日本继续加强同东南亚各国的经济联系，并且在 1969 年开始对东南亚国家进行 ODA 项目援助。因为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外援助是将对外贸易和投资捆绑在一起进行的，东南亚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顺差地。通过赔偿与开发相结合的经济外交手段，日本确立了对东南亚经济政治的影响。“赔偿外交”取得了很好的政治效果，不仅改善了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而且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互惠互利”的方式，开拓了针对东南亚国家的产品销售渠道，为日本以经济外交手段参与主导地区事务找到了突破口。

另外，日本的“经济中心主义”不排斥加强国际交往的外交互动。日本“回归国际社会”加入联合国相关组织的愿望，还必须获得作为常任理事国的苏联的最终同意。为了减少吉田内阁时期对美一边倒政策给日本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鸠山一郎内阁于 1956 年实现了日苏邦交正常化，并顺利加入联合国。日本外务省于 1957 年首次发布《外交蓝皮书》，其中确认了“外交三原则”：联合国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国家相协调、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其中，“以联合国为中心”，目的在于借联合国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改变战败国形象。“与自由主义各国协调”，实际上是与美国协调。1960 年新日美安全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巩固了日美同盟关系。“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目的在于改变二战时日本的侵略者形象、参与亚洲事务、谋求资源和市场的现实需要。联合国、亚洲、日美同盟是战后日本外交的“三大组合”。可以说，长期以来，日本外交为调整这“三大组合”，付出了巨大努力。^②

（三）开展“多元化”的自主外交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日本国际经济地位的提高及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

①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第 801 页。

② 細谷雄一「外交の新たな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求めて」、<http://www.nippon.com/ja/features/c00201/>。

其外交战略从服务于经济大国转变为加强自主外交，并力争参与主导亚洲乃至国际事务。在国际环境和国际格局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日本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前提下进入自主外交的探索期，这一时期日本外交的基本特点是追求自主性和外交渠道“多元化”。

日本谋求的主体外交是通过“多元化”的对外关系表现出来的。

第一，1972年，以日中恢复邦交为标志，日本的外交战略开始由从属型向自主型方向努力。尽管日本恢复与中国的邦交，是美苏冷战格局及国际形势变化的体现，也存在中日两国民间友好的推动和中国“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立场”使然。^①不过，若没有基辛格和尼克松的先后访华，日本不可能率先与中国恢复邦交，借此表达日本一定的外交自主性，也是日本对于美国及国际社会释放的政治诉求。

第二，中东石油危机，成为日本加强对中东外交的重要契机。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为打击以色列及其西方支持者大幅提升石油价格。日本转而放弃追随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以此换取石油输出国组织对日本放松石油出口限制。作为能源贫乏的日本对中东石油进口依赖严重，因此，从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保障”利益出发，日本公然与美国的亲以色列立场划清界限。可见，在中东外交上，与日本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能源外交”和日美基轴外交发生了严重冲突，表现出日本基于国家利益的自主外交姿态。^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日本谋求日美关系“对等化”的政治诉求。

第三，通过加入西方七国集团，体现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日本于1975年参加了首次七国集团峰会，其经济大国地位获得西方国家的认可。作为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日本在各种国际场合自诩代表亚洲国家，力图展现出日本自主外交的强烈愿望。

第四，通过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等体现日本外交渠道的多样性。1971年日本外务省建立“国际交流基金”，加强日本与国际社会的文化及学术交流，以增强日本的国际影响力。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提出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指出日本外交应发挥在经济、文化、安全、教育、科技、能源、粮食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可以说，20世纪70代日本的“主体性”外交，主要表现为外交形式的

^① 参见冯昭奎：《日本外交：从战后到冷战后》，《太平洋学报》1994年第2期。

^② 同上。

多样性和“多元化”。日本在保持日美同盟关系的前提下，加强自主外交，以取得战略主动及扩大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并在参与国际事务时争取话语权和主导权，突出表现在同中国邦交正常化并签署和平友好条约，通过提出“福田主义”加强同东南亚国家的交往等等。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的经济外交成为缓解本国能源危机的主要手段，也是提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理念的动因。

二 基于政治大国理念与“正常国家论”的“国际国家”诉求

冷战结束前后，日本外交战略理念有质的变化，“经济中心主义”向“政治大国”和“正常国家论”转化，形成日本对外关系由经济外交为主转向“国际国家”的政治诉求，表现出谋求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战略意向。

（一）作为“国际国家”的日本外交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外交战略的目标确立为做“国际国家”，提出“政治大国”构想，并力求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也就是说，日本希望成为与“经济大国”相称的、能够参与国际事务的“国际国家”。尤其是中曾根康弘的“政治大国”战略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日本外交决策者已实现从经济优先向经济政治并重的观念转变。这一时期的日本外交，主要呈现如下几方面的特征。

第一，正式确定“日美同盟关系”概念，强调日美“两国都负有世界性的责任”。1981 年，铃木善幸首相在访美期间，进一步明确日美同盟关系。自新日美安全条约签署以来，日美“被保护和保护”关系向着同盟关系不断深化的方向发展。事实上，日美同盟的军事合作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只是日本力求改变过去一味依赖、顺从美国的方式，强调所谓日美“两国都负有世界性的责任”的重要性而已。1982 年 11 月出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在任职的五年中，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密切联系，被称为推行世界性新保守主义运动的“三驾马车”。^① 1983 年 5 月，在威廉斯堡举行的西方首脑会议上，中曾根康弘支持了关于全球安全保障问题的讨论，并提出日本作为成熟的经济国家应担负起国际安全保障的责任。1983 年 7 月他进一步表示，今后日本作为

^① 参见罗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301 页。

国际国家应同经济力量相称地在政治方面也积极发言并履行义务，“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①这反映了他希望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战略诉求。

第二，以“战后政治总决算”，谋求政治大国战略愿望。在中曾根康弘看来，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主动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扩大国际开发援助，要努力成为政治大国。中曾根执政时期，在对华、对美、对苏等国家关系上均取得较好成效。1983年7月，中曾根第一次明确提出要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1985年，中曾根首相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政治大国化论”、“不沉航空母舰论”、“从战后解脱出来”等新保守主义理念，谋求对日本二战后历史的彻底清算。^②可以说，中曾根适时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政策主张，充分迎合了日本民族主义者追求“政治军事大国”梦想的心理渴求。同时，“为了克服日本人在遭到战败、占领和国际谴责之后而自承负面形象，中曾根试图用培养民族自尊和理解他国传统之间的平衡以转变民族意识”^③。他主张大力培养日本国民的“国防意识”、“爱国心”和民族意识，重新确立国家权威，不断增强日本作为政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分量。他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实质，就是力求通过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来重塑日本的所谓“民族精神”。但是，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出现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影响了日本同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双边关系。

另外，日本积极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和ODA。基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榜样，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在区域经济合作上也表现了积极的姿态，同澳大利亚等国提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构想，表达了日本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意愿。ODA一直被日本自诩为承担大国道义和责任的重要表现方式。这一时期日本加大了对外援助的力度，对其确立“国际国家”形象有一定的帮助。

20世纪80年代，日本已把外交触角伸向世界各地，尤其是重点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力图成为东南亚地区的主导者，还积极发展与欧洲各国的关系，突出自己已是日美欧三极中的一极，并寻求欧洲对日本走大国化道路的支持。同时，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使战后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族主义复苏，

^① 参见五百旗头真主编：《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第226页。

^② 参见毛里和子：《日中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徐显芬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51页。

^③ 肯尼思·派尔：《日本的问题——新时代的国力与目标》，台北：金禾出版社，1985年，第96、114~115页。

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及否认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言行屡屡出现。因战败而形成的和平主义意识日渐淡化，并逐渐认可了以日美同盟“借船出海”的现实存在。日本不再甘心安于经济大国的现状，渴望成为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当的政治大国，力图重新登上参与国际事务的政治舞台。

（二）后冷战时期日本外交战略理念的变化

1989 年冷战结束的一系列国际局势变化，为日本迎来所谓“第三次开国”机会。在日本一些学者看来，“开国”的含义带有一定的“革命性”，这无疑是日本对外战略“调整”的极好契机。^① 冷战后的“吉田主义开始分化为两种立场：一是继续以和平的国际协调的经济国家为中心的立场；二是重视日美同盟，致力于修改宪法和行使集体自卫权，与美国共同维持秩序的立场。前者是站在自由主义国际政治观上的和平发展主义，主张冷战后的日本必须发挥作为‘全球性民生大国’的作用；后者是坚持现实主义观点，主张为保护日本的安全和维持国际秩序，应该在安全保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②。历史事实表明，后者已经成为冷战后日本对外战略理念的主流舆论：日本应以日美同盟为中心，扩大日本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的作用，彻底摆脱和平主义的束缚，成为所谓“正常国家”。冷战后，“1955 年体制”的崩溃，导致革新政党的衰落和保守政党的不断壮大，日本政坛的“正常国家论”和“总体保守化”导致日本对外关系及外交政策发生质的变化。

第一，冷战后产生“否认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民族主义思潮，严重影响日本与中韩等周边国家的关系。日本学者毛里和子认为：“‘总体保守化’后所表现出来的新民族主义，与（20 世纪）80 年代的‘新保守主义’有很大不同：第一，新民族主义尝试通过回归民族和传统来重建日本的认同感，为此就需要‘对历史加以修正’，把正视日本侵略事实的历史观斥之为‘自虐史观’；第二，对和平宪法、民主主义教育等一系列‘战后’进行改写。他们公然提出要修改宪法第九条。”^③ 上述观点表明了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内涵扩大为在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基础上，试图修改“战后体制”赋予日本的“和平宪法”及其第九条。“新民族主义”持“自由主义史观”，主张强化国家观念。“它直接作用于政治家的思想和行动，不仅左右国内社会政

① 松本健一『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筑摩新書、2010 年、8 頁、20 頁。

② 五百旗头真主编：《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第 238 页。

③ 毛里和子：《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第 152 页。

治生活，对外交政策也产生重大影响。”^① 随之，日本保守主义执政理念在国家发展目标等重大战略层面，表现出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对外关系特征。1995年8月15日，“村山谈话”承认殖民和军国主义侵略并道歉，尚属坚持和平主义的范畴，但这种官方立场在其后的内阁中还是发生了违背“村山谈话”的一些反复，导致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不确定性。

第二，提出摆脱“战后体制”的“正常国家论”，明确关于国际新秩序的政治诉求。以小泽一郎为代表的“新保守势力”认为，自民党主流派在战后所奉行的、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外交路线，已不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要求，日本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迈进，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和政治领导人。^② 小泽一郎在1993年出版的《日本改造计划》中全面阐述了“正常国家论”。他主张修改日本和平宪法：首先，可在宪法第九条的两项中附加第三项，确定为“前两项不妨碍为了创造和平而进行活动的自卫队”可派赴海外；其次，“保持宪法现状，制定一部‘和平安全保障基本法’，规定作为一切主权国家固有的权利，让日本拥有个别自卫权，为此，确保自卫队为最小限度的军事力量，拥有作为联合国一员积极协助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权利”。在对外关系层面，小泽一郎认为，日本“同美国、欧洲并列构成世界三极中的一极”，“日本已经成为世界大国”，“逃避不了作为大国的作用”。“日本的一举一动已经影响到世界的各个地方”，日本有义务对“世界做贡献”。小泽主张要摆脱战败国地位，使日本成为与其他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正常国家”，在国际上发挥与自己国家实力相称的政治和军事作用。^③

“正常国家论”，是一种谋求改变二战以来日本国家性质的战略理念，主张把在军事上自我约束的日本变成与别国毫无二致的日本。^④ “正常国家论”的实质，就在于以“为国际安全做贡献”为由，提倡突破“和平宪法”束缚和国内外舆论牵制，重获对外动用军事手段的权利。

可以说，“正常国家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的外交政策及主张，已内化到现在日本的外交战略理念及对外关系之中。这种对内力求修改“和平宪法”、对外实现“正常国家”的理念，就是日本保守政党的共同政治目标。

① 杨伯江：《当前日本社会思潮与“新民族主义”》，《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

② 参见刘江永主编：《跨世纪的日本——政治、经济、外交新趋势》，北京：时事出版社，1995年，第61页。

③ 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年、123～125頁、16頁、110頁。

④ 参见刘世龙：《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日本学刊》2003年第5期。

“这样，冷战后日本外交的轴心，由经济外交朝着更加政治性的、包括安全保障在内的方向不断演变进化。”^① 要求在国际上拥有与经济大国相称的政治地位，成为这一时期日本外交及对外关系的重点。

三 基于大国化政治诉求的战略性外交与价值观外交

从根本上来说，国家对外目标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各国为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所作的选择。随着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日本从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强化21世纪日本国家战略的定位及对外战略诉求。

（一）21世纪初日本外交战略的定位及政治诉求

在当代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的形势下，在对外关系方面，以摆脱“战后体制”、承担“国际责任”、实施“价值观外交”等方式追求日本国家对外目标，力求实现与日本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政治大国地位。中曾根康弘提出：“作为国家的长远目标，应该追求实现自我。这是以更为理想的方式生存，实现独立，维护安全和追求基于国际责任意识自我实现。日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若日本没有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实现自我应明确国际责任，就不能在国际上实现自身的安全、独立和生存。”^② 基于上述思路，日本外交就会涉及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评判与展望、安保战略及危机管理体制、强化日美同盟和开展亚太地区外交等区域性构想等一系列课题。其中，将“国际责任”作为日本“自身的安全、独立和生存”的要件，反思“吉田茂主义”，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提出了确立未来日本国家战略或基本构想，明确了21世纪日本外交战略的长远目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002年的《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新时代、新视野、新外交》明确指出，战略的基础是国家利益，日本必须基于国家利益制定长远战略。“今后开展日本外交，有必要制定作为国家应有的明确的战略。”该战略报告提出所谓“开放的国家利益”，体现在：（1）维护日本的和平与安全；（2）维护自由贸易体系；（3）维护自由、民主主义、人权等价值以及推动国际人文交流；（4）积极推动以学术、文化和教育为主的民间交流。^③ 这些内容不仅反

^① 細谷雄一「外交の新たな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求めて」、<http://www.nippon.com/ja/features/c00201/>。

^② 中曾根康弘『二十一世紀日本の国家戦略』、PHP研究所、2000年、19頁。

^③ <http://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02/1128tf.html>。

映出日本渴望参与国际事务，确立与其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相符的政治大国地位，还表现出刻意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对外战略理念。虽然该战略报告指出，只顾本国的狭隘国家利益必然导致与他国的对立，只有与他国的国家利益长久共存的才是真正的国家利益，但其中的“价值观理念”势必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形成对立与摩擦。这虽然是一个智库报告，但已经提出了国家利益的问题，明确提到日本应基于国家利益制定外交战略。事实证明，这样的“国家利益”已经成为21世纪初日本追求对外战略目标的指导思想，并贯彻于日本的外交战略之中。在2005年出台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现状、背景与日本国家战略》的智库报告书中，再次强调和确认了日本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突出了“维护日本的和平与安全”和“维护自由、民主主义、人权等价值”两大要件，表明日本树立对外战略目标的同时，进一步确认了其坚持“价值观”取向的外交方针。该报告关于日本对外战略侧重点主要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在安全保障方面，要在拓展日本防卫能力的同时，通过以日美同盟为主导的国际合作，向改善国际安全保障环境的方向发展；二是在日本周边推动和平繁荣、自由与民主价值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东亚共同体”的战略构想。^①可以说，冷战后日本对外战略原则是突出强调“国家利益”，对外战略的侧重点是以日美同盟为主导的安全保障机制和战略性亚洲外交。

（二）21世纪初日本外交战略及其对外关系

进入21世纪后，从国家战略原则、战略重点及国家利益出发，以政治、外交及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法规为象征，摆脱战后体制，以“正常国家”为诉求，实质性谋求全面大国化已经成为日本各派政治势力的战略共识。这样的战略共识外化为强化日美同盟、联合国外交、亚洲外交等战略重点，并以“战略性外交”和价值观外交的形式加以落实。

第一，追求“对等”的对美外交。日本历来把能否维护日美安保体制视为日本外交成败的关键。日本强调“日美同盟是亚洲和平与繁荣的基础”，并将之定位为“亚太地区的稳定装置”。日本的“正常国家化”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利益交汇点，是日美同盟强化的原动力。21世纪初，日美同盟已经演化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和日本大国化战略相结合的产物。

21世纪初期，日美基于各自的安全战略需要，进一步扩大日美同盟的发展空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日本制定《反恐对策特别措施法案》、

① <http://www.ceac.jp/j/index.html>

《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等一系列新的法案以配合美国“反恐”，进一步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2003年7月，日本国会通过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的《伊拉克复兴特别措施法案》。这是日本应美国要求首次向战斗发生区出兵，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在海外派兵问题上的重大突破，也是日美同盟关系的重大突破。2004年2月，日美通过签署新的《日美相互提供物资劳务协定》，进一步扩大了日本后勤支援的范围。3月，日本内阁又出台“有事立法”相关联的《支援美军活动法案》、《国民保护法案》等七项法案，“日美同盟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朗。2005年10月，“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发表了《美日同盟：为了未来的改革与重组》中期报告，提出了美日军事一体化的具体措施。2009年5月，“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制定一份共享系统运用情报的日程表，鲜明地反映出将加强日美同盟和扩大自卫队的作用。2015年4月，“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重新修订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其中规定日美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可以说，“9·11”事件以来，日本加快“借船出海”的步伐，积极构建日美对外干预型军事体系，借助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不断扩大日本在该地区安全秩序建构中的作用。

第二，旨在主导地区事务的战略性外交。日本通过改善亚洲外交，就东亚经济一体化、地区安全和国际问题与亚洲国家进行多边战略对话，提升日本在亚洲事务中的发言权和主导权。同时，日本力图建立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联盟，增强在东亚地区的支配力。关于重视亚洲外交的战略意义，中曾根康弘在《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中明确指出，“9·11”事件后，“关于外交问题，亚洲外交非常重要，应当以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构筑东亚的多边安全保障和经济合作机制”^①。日本的亚洲外交战略的核心内容，是开展多边安全对话。同时，日本还希望通过发展多边安全对话，来减轻对美依赖程度。^②

安倍晋三在2006年曾提出“战略性亚洲外交”的外交方针。方针的具体内容是探讨创设有关机构和交流基金以在环境等领域推进日中共同研究。方针还提到“扩大接收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各国的留学生”、“加速缔结经济伙伴协定（EPA）的磋商”等内容。^③但日本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日益借助于

① 中曾根康弘：《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联慧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270页。

② 参见刘世龙：《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日本学刊》2003年第5期。

③ 共同社2006年8月23日电。

“价值观外交”的力量。麻生太郎曾在日本第166届国会上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外交方针，表示：“现在，在位于欧亚大陆外圈形成弧形的地带，分布着沿自由、民主主义的道路前进的国家，或现在将要起步走这样道路的诸多国家。在这里，我国想扩大自由之环。”^①其目的在于联合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组成“排他性”战略联盟，共同对付所谓“异己势力”。在地区经济合作方面，小泉首相于2002年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其后自民党历届政府主张以“10+6”模式削弱中国的影响力，争夺东亚合作的主导权。民主党的鸠山由纪夫出任首相后，重提东亚共同体的构想，但菅直人上台后缄口不提东亚共同体，反而强调加入以美国为主体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②安倍晋三2012年底再次上台后也将TPP谈判作为日本经济增长战略之一。

第三，着重“遏制”的对华外交。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既期望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受益，又担心中国与其争夺地区主导权，认为中国未来有可能在军事上对日构成威胁。因而，日本对华战略具有“不确定性”。^③日本这样的对华矛盾心态，导致其对华政策保持两手准备。为了改变小泉当政期间日中关系的“经热政冷”局面，安倍内阁提议发展日中战略互惠关系。这体现了安倍内阁务实的一面，但在外交上采取的“价值观外交”，表现出日中关系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福田出任首相后明确表示，要继续推动日中战略对话与合作，巩固和加深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并与中国签署了《日中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但是，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是从日本国家利益出发的，并以价值观外交遏制中国，这就决定了政策的摇摆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2005年2月的“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后发表共同声明，确定了12项关于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首次将所谓“鼓励和平解决有关台湾海峡的问题”列为日美共同战略目标之一，大有插手中国内部事务的意图。2009年5月1日召开的“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针对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提高的中国，双方在敦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国际‘利益相关者’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求其提高军事透明度”。^④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

① <http://www.cn.emb-japan.go.jp/fpolicy/seisaku070126-1.htm>.

② 首相年頭所感「平成の開国元年に」、『産経新聞』2011年1月1日。

③ 参见刘世龙：《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日本学刊》2003年第5期。

④ 共同社2009年5月1日电。

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实施所谓“国有化”,日中关系再次陷入屡屡恶化的怪圈。麻生太郎曾表示,发展日中关系的所谓“友好”只是获利益的手段而已。这已经明确表达了日本对华战略的本质。未来十年,日本决策者对华政策理念仍然具有或然性。

综上所述,日本战后 70 年的外交战略理念经历了“经济中心主义”、“正常国家论”和大国化政治诉求等演进历程。其中,基于“经济中心主义”的外交战略理念,开创了 20 世纪 50~60 年代“吉田茂主义”经济外交的黄金时代,为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大国”身份开展“多元化”的自主外交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及国力基础。在冷战结束前后的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日本基于“政治大国”理念与“正常国家论”的“国际国家”诉求,反映出日本力求改变“战后体制”的强烈意愿。进入 21 世纪,日本开展的战略性外交与价值观外交,是基于“大国化”政治诉求而进行的“自我实现”,完全是从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的。战后日本外交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战后日本外交是以“日美基轴”为基础展开的,在考察日本外交的诸多问题时都不能不考虑日美同盟这一决定性因素;二是日本实现经济大国战略目标后,在外交战略上必然谋求成为政治大国的战略构想,这也是未来日本外交的重中之重。在日本看来,“作为全球性角色,日本已在世界上得到承认。在经济、高新技术等方面,日本获得了举世公认。这本应与日本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也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作为全球性角色发挥作用,日本外交才有出路。”^①

2013 年 12 月出台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備计划》,开始明确把中国视为主要潜在军事威胁和防范对象。^② 2015 年出台的关于解禁集体自卫权的 11 项安保法案,用安倍首相的话来说都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尤其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在官方文件里提到的战略概念,其内容涉及加强日美同盟关系、提升自身的防卫实力、“爱国心”,这也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三点要件。这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而制定的国家战略,是日本外交战略的重大变化。基于这样的战略,现在的日本外交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和“战略性外交”,总体特点

^① 渡邊啓貴「日本外交の活路はグローバル・プレイヤーをめざすことにある」、<http://www.nippon.com/ja/column/g00004/>。

^② 参见张沅生:《走出危机、重启对话与合作——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前景》,《东北亚论坛》2015 年第 5 期。

表现在“价值观外交”之中。

从日本的战后外交经历三个阶段并逐渐演变到现在的外交战略路径，可以预见，“正常国家论”关于大国化的政治诉求，逐渐显露出日本“传统的国家主义”面目，并将成为日本主流的对外关系理念和实践目标。

Japanese Diplomatic Strategy and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Post-war Era

Lyu Yaodong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diplomatic strategy has undergone three major stages, referring to the policy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the “Japan’s normalization” and the strategic diplomacy in pursuing to become 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wer. Japanese strategy of “giving priority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opened up a golden age of economic diplomacy based on the Yoshida Doctrine from 1950s to 1960, having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Japanese self-asserted and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as an economic power in 1970. In the 1980s and 1990s, Japan became active in attempting to be a great political power and an “international actor” on the basis of the “Japan’s normalization”, showing the strong desire for changing the post-war regime.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Japan, considering its own national interest, has made effort in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ic diplomacy and the “values diplomacy”, which gradually exposes Japanese “traditional nationalism” and will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外交戦略の理念及び対外関係の軌跡

呂耀東

戦後70年間にわたる日本の外交について、「経済中心主義」、「普通国家」論、そして大国化を目指す路線などといったプロセスを経てきた。「経済中心主義」という理念は、冷戦前後の1950～60年代に、「吉田主義」という経済外交黄金時代を切り開き、1970年代には経済大国としての日本が多元的な自主外交を展開するため豊富な財力や国力形成に向けての基礎を固める役割を果たした。冷戦終結前後の1980～90年代は、「政治大国」及び「普通国家」論に対する「国際国家」を目指していく中で、戦後体制を変えようとする意欲が反映されている。21世紀に入って展開している戦略的外交や価値観外交は、大国化を望むことに対する「自己実現」であり、すべて日本自身の利益のためのものである。こうした大国化への路線を軸とする「普通国家」論により、「伝統的国家主義」という姿が現れ、これが対外関係における理念や目標の中心軸になっていくであろう。

(责任编辑：李璇夏)